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学术前沿系列 …… 朱庆葆 主编
城乡研究辑

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以陕北晋西北为例

董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学术前沿系列 …… 朱庆葆 主编
城乡研究辑

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以陕北晋西北为例

董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以陕北晋西北为例 / 董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12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前沿系列 / 朱庆葆主编. 城乡研究辑）

ISBN 978-7-214-24696-7

Ⅰ. ①抗… Ⅱ. ①董… Ⅲ. ①农村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Ⅳ. ①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4400 号

书　　名	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以陕北晋西北为例
著　　者	董　佳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页 2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4696-7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存续时间虽不长，却给现代中国带来剧烈长远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中华传统文明在欧风美雨和内忧外患中的深层次文明危机，同时中华民族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求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奋斗。在此过程中，中国历史在近代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其势如洪峰激流，奔腾而下，既有转型间的坎坷，也有历史性的成功。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和乡村转型，正是中国近代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建树颇多，也独树一帜，体现出多样性、开放性、国际化和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多重特征。虽然各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千差万别，但境外知识的外在影响、政治机构的宣传动员、经济组织的分工协作、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都发生了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改变。不过，鉴于各地城市和乡村的组织主体、建设思路，乃至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建设的判断和认识各不相同，要想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城乡建设进行深入探讨是很难的，需要通过具体个案来进行实证研究，这样才看得更深入更清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出的学术前沿系列“城乡研究辑”所收录的这九种书就是基于上述理解所展开的区域专题研究。

从选题看，这九种书研究的对象分别是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根据地农村社会秩序的移异、民众教育运动、城市下层社会变迁、城市下层社

会调控、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民国乡村实验区建设，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等经济城市发展路径等主题。其选题既有微观的城市地方自治、城市下层社会，也有区域乡村社会改造、民众教育运动，还有相对宏观的区域城市发展转型分析。尽管主题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眼光。应该说，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视角，无疑使大家把研究的焦点对准社会，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题小作，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雕细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九种书并非简单的历史描述和勾勒，而是内容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其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套基于理念而开展研究的书系，真实记录了民国以来中国社会不断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底层城乡民众在“现代化”这一历史巨像下的艰难转身。虽然学界已问世的近代中国城乡转型论著不少，但是探寻城乡社会转型特别是底层社会变迁的并不多。这九种书的背后都蕴含着一种价值追求，“改变中国”“富强中国”正是这其所体现的精神灵魂和思想关怀。

思想取决于眼光。这九种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历史眼光、国际眼光、现代眼光。所谓历史眼光指的是，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变迁并不是凭空启动的，而是在近代中国整体嬗变的大背景下和先进中国人的前后接续中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其所涉及的各地城乡变化，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史，就是一个近代中国转型的缩影。这就需要我们把城乡社会的变化放到百年中国发展转型的背景中去理解把握，讲清楚百年中国城乡嬗变的历史轨迹，而且社会变迁的影响是长期的，对后来新中国也有着长远影响。第二，所谓国际眼光就是这七部书虽然主题都围绕中国近代城市或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但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却是国际化的，汲取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的数理统计方法。同时，近代中国城乡社会变化的本质之一是告别传统、拥抱现代、融入世界，外部的国际影响和国内的世界眼光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开启中国变革的重要切入点。第三，所谓现代眼光就是将近代中国城乡变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并以社会现代化、文明化、组织化、制度化推动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社会进步。

近代中国城乡的转型发展，也离不开“思想”“激情”和“行动”的结合，三者缺一不可。思想是目标导向，激情是为实现理想而勇于投入，而最终思想和激情都要落实到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的行动上。既然是社会的变革就离不开近代中国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这九种书的第三个特点，还在于展示了如何在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社会分裂的剧烈变动下探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路径。在这些探索中，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既有政党引领的革命方式，也有社会推动的改良方法。各种路线方案中都有大量的历史细节，提供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思想到行动，从政党到社会，从沿海到内陆等各个环节的各种细节，从中既可以看出历史之“应然”，也可见得历史之“必然”，最终经各种思想、各种方案的现实筛选，历史最终选择了既有思想，又有行动，思行合一，具有思想力、组织力和行动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改革模式。

这九种书虽然是讲历史，但对当前的社会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虽然这九种书的作者主要是历史学专业研究者，但他们在思考近代中国城乡社会变革上却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历史学家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分析的思路既有历史学的，也有政治学的，还有经济学、教育学、统计学的，特别是有了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路径及其分析就有了比较系统和严谨的思维方法，包括近代中国城乡发展的思路、社会对政策方针的反应的分析等。二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有参考价值，很多过去的历史经验在现代值得人们吸收借鉴。特别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较好地处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开放，而民众又有较强的幸福感、满足感和收获感。这些压力和制约既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变革面临的历史使命，也是目前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现实要求。三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展虽涉及范围极广，但最终落脚点还是人和社会，在这方面这九种书在研究分析过程中也积极引入了

经济学、统计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城市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方法。

近代中国城乡转型的主题是“现代化”，而变革的两项内容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社会的组织化”。基于这样的思路，这九种书既真实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为何而变”，又深刻勾勒了中国社会“如何改变”。我认为这正是其出版的意义所在。

学术贵于创获，而创获的途径各有不同。作为国内最早开辟民国史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始终坚持学术上的“双轮驱动”。一方面，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对关系国家民族利益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问题开展研究，形成面向国家目标的系统性成果；另一方面，鼓励在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开展自由探索和学术创新，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学术方向，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近年来，中心先后推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4 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本)，组织两岸四地70位知名学者联袂打造了《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等力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学术效应。同时，中心也不断加大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的力度，长期致力于培养更多具有前沿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学术新人和学术新作。此次推出的学术前沿系列“城乡研究辑”，就是基于这样思考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年轻学者尽快成长，也为学界奉献更多有关近代中国城乡研究的新作！

朱庆葆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4月

目　录

绪论 *1*

一、陕北、晋西北的基本概况 *1*

二、学术史回顾 *8*

三、研究旨趣 *13*

第一章　根据地上层政治体制的转变与演化 *19*

第一节　长征后的中共策略调整 *19*

第二节　根据地代议制政体的出现 *23*

第三节　“一元化”后边区政体的转变 *31*

第四节　社会的新变化 *38*

第五节　人民民主的制度演进 *45*

第二章　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革命化重构 *49*

第一节　重建基层政权的缘由 *49*

第二节　村选动员和选举 *54*

第三节　村政权运行绩效 *69*

第四节　革命与民主的融合 *80*

第三章　根据地乡村经济和阶级关系的转变 *87*

第一节　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 *87*

第二节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　89
第三节　乡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97

第四章　根据地社会结构的移易　109
第一节　农民负担与农民分家　109
第二节　划分村界与乡村地权变迁　116
第三节　宗族的式微　126

第五章　根据地乡村的集体化　132
第一节　农业变工互助　132
第二节　农村合作化　153

第六章　粮食征收中的农民与国家关系　181
第一节　征粮问题的由来　181
第二节　农民的抗拒　186
第三节　派遣工作团　195
第四节　开评议会、群众大会　198

结　论　206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9

绪　论

一、陕北、晋西北的基本概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西北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即从过去少有人问津的边缘封闭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革命实验场”。但这种变化并非源自内生，而系外力介入的结果。变化的直接动因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革命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中共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革命队伍、革命思想，更引起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剧烈而炫目的变化。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陕北、晋西北地区的变化虽主要由于中共渗入而起，但中共并不是促成变化的唯一因素，陕北和晋西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对这一地区发生历史断裂性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而要研究农民农村地区变迁，就必须注意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

从自然生态看，本书所研究的陕北和晋西北位于黄土高原。其中，前者地处陕西北部，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东隔黄河与晋西北相望，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理范围包括延安、绥德、米脂、延长、安塞、葭县、横山、清涧、吴堡、靖边、定边、神木、府谷等20余县，面积9.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总的来说，

这里属于沟壑纵横、梁峁密布的黄土高原地貌，平均海拔1 000米，森林稀少、草原灌丛也不多，是典型的大陆性和高原性气候。季节冷暖变化剧烈，全年雨量较少，且下降时间集中，风沙大，霜期长。人口方面，每平方公里15.2人，低于当时陕西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60.5人和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39.54人。[①] 境内河流虽有黄河、洛河、延河、无定河、大理河等，但由于植被破坏，每遇天旱，河多干涸，仅黄河可通舟船。陕北由于北接沙漠和滥采滥伐，毁林情况亦十分严重，一旦刮风，则飞沙漫天，覆盖良田，风、旱、雹、冻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因此，这里地多人少、河多水少、沙多林少的特点十分突出。在地域文化上，陕北既是国内东部与西部多元文化的交会，也浸润着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农业文明。由于长期的异族和外地移民迁入，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交流，这里成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中原与塞外相互融合的大舞台。这个特点对陕北民众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进而促使陕北人民形成坦荡、开阔且豪爽果敢、朴实厚道的地域性格。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多元文明的交融碰撞并没有给陕北带来繁荣，反倒是受自然生态限制，长期是中国最贫穷的内陆地区之一。1936年到此造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又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

① 曹占泉：《陕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象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①]有了这种地理上的天然屏障，陕北虽然在近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外界骚扰，特别是外国列强侵犯，没有出现我们在中国东南和沿海地区看到的因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社会变迁，但也由于同外界的隔绝而愈发贫穷落后。从地区发展农业的水利条件看，陕北用于蓄水和防洪的水利资源匮乏，加之原本干旱缺水、降水季节不均，正常农作物生长所必需水源严重不足，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也无法保护农作物，因此陕北农民的生活长期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农作物亩产量极低。清嘉庆时葭县“农夫牛一头约耕二三百亩，地固硗瘠，所收亩三斗辄称丰岁”[②]。道光年间肤施县“土俗以三亩为垧，每垧所收，丰年不过五斗”[③]。至民国后农作物产量更低得可怜。1919 年陕北米脂籍国会议员兼总统府顾问高增爵呈报北京政府请求减免陕北 23 县地丁附加税呈文中讲到“他省每亩收八斗一石之间，北边三亩为一垧，或曰一垧仅收三斗”[④]，意即一亩地只收一斗。种植工具方面，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是传统、简陋的铁制或木质工具，无论是工具的数量还是质量相对帝制时期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而即便如此，这些最原始、最落后的生产工具的数量也无法满足农民日常生产需要。因此，传统的畜力耕作在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大量沿用，种植新品种的传入几乎没有，化肥更很少使用。总的来看，陕北严苛的自然条件、支绌的生产工具，以及原始的耕畜饲养结构，只能使农民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不仅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经营，改善农民生活，更无法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从而限制和阻碍了陕北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发展。

---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第 61 页。

② 高珣：《葭州志卷二》，嘉庆十四年刻本。

③ 卢坤：《秦疆治略：肤施》，道光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0 年。

④ 高照初：《米脂县志卷九》，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在社会层面，如果说上述恶劣的自然环境为陕北的不安提供了酝酿革命的温床，那么，恶劣的地方政治生态则是促使这种演变的导火索。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发动革命前，陕北就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陕北军阀井岳秀与地主、土豪相勾结，组织地方民团，对民众进行经济剥削、政治迫害和武装镇压。广大农民承担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他们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挣扎，渴望求得翻身解放。与此同时，陕北地方政府垂涎鸦片种植的丰厚利润，强迫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鸦片，并大肆暴敛烟款，仅“神木一县就派了几万元，光南区就派来多个催收烟款的人员。这些收款人员对待群众极其残暴苛刻。群众交不起烟款就遭吊打，逼着群众变卖家产交款。一些地主豪绅乘机贱买群众家产大发其财”①，普通民众则挣扎在生死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土赋予民众宽厚忍耐的地域性格，但残酷的现实却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当时的一首《参军歌》即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歌词是这样的：“红彤彤的太阳照村头，前沟里开过来红军的队伍。地主收款委员逼得咱无路走，下决心要把红军投。红军做事真个的好，地主豪绅齐打倒。文约账债用火烧，苛捐杂税一笔消。”②在这一背景下，陕北民怨沸腾，革命如一个蓄势待发的火药桶，一触即发。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前，这里就建立了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趋于成熟。到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迅速燃遍整个地区。陕北由此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告别边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而晋西北，自然环境与陕北颇为相似，二者同处西北黄土高原。晋西北的地理范围包括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汾阳县、中阳县、石楼县以北，以及平绥铁路以南的山西西北部地区，总计35个县，面积6万多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二之《神府革命根据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447页。

平方公里，人口约 350 万人。在地形上，晋西北以吕梁山为界，以东是由河水冲击而成的大同、崞县、太原三大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盈，以西则是山地型的黄土高原，黄土广布，在长期流水侵蚀的作用下，形成了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貌。这里地形的基本特点是灌灌的高山和险峻的深沟，几乎随处可见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层层矗立的峰峦，主要的山脉有吕梁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等，海拔多在 1 500 米以上。其中，吕梁山是第一大山脉，北起岢岚、岚县一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晋西南。管涔山是第二大山脉，其北起宁武一带，向东经雁门关、繁峙与五台山相接。[①] 由于山脉众多，交通不便，所以只能凿山开路，一条条并不宽敞的公路，由下向上，缓缓延伸到山峰之中，既十分壮观，又非常险峻。在这万山丛中又流淌着汾河、桑干河等河流，河山交错，凶险无比。历史上由于晋西北特殊的山川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特别是这里山脉纵横，居高临下，更成为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另一方面，晋西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东临华北平原，西隔黄河与陕北神府县相望，是华北通向西北地区的门户，因此对中共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在中共眼中，这里不仅是保卫陕北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物资补给的来源，还是中共在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堡垒和重要根据地。加之晋西北与陕北两地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相近，都有面积广袤、地形复杂、人口稀少的特点，因此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将晋西北与陕北一同划入中共西北局管辖范围，纳入 1942 年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②]的防御范围，由贺

① 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② 该军于 1942 年 5 月在延安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下辖八路军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绥军区部队和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及炮兵团等部。抗战胜利后，实际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1948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辖晋绥军区和陕甘宁 5 个分军区。同年 11 月，改称西北军区。

龙、关向应负责，并派“延安农村调查团”[①]对两地进行农村实地调查。在经济生产方面，由于晋西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量少，所以旱灾频发，基本上是“十年九旱”。囿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水源的匮乏，该地区农作物基本上是一年一熟，且产量较低。尽管历史上晋西北的一些地区如岚县、兴县、临县、离石等曾是地区有名的“米粮川”，有所谓“一年丰收三年饱”的美誉，但民国以来，该地区战乱频仍，经济严重萎缩，加之冰雹、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袭扰，因此晋西北人民的财富增殖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恶化了境内居民的生存条件。

不过，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晋西北与陕北在地理、民情、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与陕北不同的是，这里在中共进入前并没有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这是因为晋西北长期地处政治统治的边缘，受外界社会变动的影响较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形态，居民与外界往来甚少”[②]，基本保持浓厚的封建经济原貌，农民接触可以选择的社会观念和政治信息几乎不存在。作为中国典型的封闭乡村社会，在晋西北以革命性社会重构为目标的农民自发运动稀少，村庄孤立分散，农民对革命淡漠，没有接触过新思想，除了向政府缴粮、

① 1942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整风的号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带领马洪、刘英、雍文涛、薛光军、曾彦修、尚明、徐羽、许大远和薛一平九人于1942年1月26日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奔赴陕北、晋西北抗日前线，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农村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亲自动手拟定调查提纲，整理调查材料，撰写调查报告，还具体指导团员进行调查，不断总结调查的经验和体会。调查结束后，他以亲身感受写了总结报告。该调查为中共历史上继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社会调查。张闻天本人经调查，在宏观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独到见解，其调查文稿也为后来中共中央制定根据地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切实依据。关于“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详细情况，参见刘英《我对晋陕调查的回忆》，载《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马洪、尚明、曾彦修等《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

②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山西：黎明书局，1933年，第884页；李向前：《抗日战争与中国西北农村社会的变动——兼谈张闻天的“新式资本主义”观点》，载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纳税和应差外，农民几乎不与政府发生关系。因此，在这样一个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缺乏革命动力的农村地区，要想发动革命，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平静的状态一直到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山西才彻底打破。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先后组织数次抵抗，但最终无力挽回颓势。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的失守标志着山西境内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大军团作战基本结束。受民族危亡的刺激，晋西北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开始自发组织抵抗。与此同时，中共也确立进军山西，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军事方针。193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在《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在山西建立敌后游击抗战的重要基地。[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迅速深入敌后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晋西北距陕北仅一河之隔，中共中央对作为陕北前沿阵地的晋西北极为重视。1937 年 9 月 16 日至 19 日，毛泽东即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要求 120 师向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北部活动，并向绥远、大同等地开展游击，以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7 年 9 月中共 120 师东渡黄河，很快占领晋西北偏关、兴县、保德等地，加之地区“牺盟会”“战动总会”等群众组织的掩护配合，晋西北根据地县区政权建设迅速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共的直接介入，晋西北地区很快出现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而是很快随着山西正面战场的基本结束，

① 毛泽东在该文中说“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使用 115 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地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地部分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见毛泽东：《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29 页。

阎锡山与中共矛盾激化，在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后宣告完结。[①] 面对阎锡山1939年年底的军事进攻，中共迅速反击，终于在赶走晋军后正式在兴县建立了新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

二、学术史回顾

多年来学界对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社会的研究投入了巨力，研究成果不可谓不繁盛，用汗牛充栋形容亦不为过。特别是近年来一些研究新视角、新史料、新方法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对一些传统问题的既有认识，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政权民主化是中共改造根据地原有政治生态的理论出发点和改革的方向，而官员民选、参议会、“三三制”、党派协商则是保障和落实这种制度建设的重要表现。学界关于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圣清的《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②]，该书全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对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法制建设、民主选举、“三三制”原则及精兵简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根据地政权性质应是抗日的、民主的和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完全摒弃了苏维埃政权模式，是真正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政权模式，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不过，杨书涉及范围略大，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各地执行政策情况亦参差不齐，因此这种整齐划一的“同质化”研究，恐怕只能说明中共组织和行政命令的高度一律，而无法真实反映政策在地方贯彻和执行的具体情况。因此，近年来逐渐有更多的学者转向微观个案研究，试图对不同根据地

① 所谓“晋西事变”指1939年12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下，阎锡山派六个军分三路进攻驻隰县、孝义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这是抗战时期阎锡山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次反共事件。

② 杨圣清：《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